

· 调查报告 ·

北京、广州、香港女性人口就业比较研究

刘小聪

为了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女性人口就业条件、机率,就业观念,就业中的男女平等意识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广州市妇女联合会和香港大学合作,于1988年9月至1990年10月,历时25个月,对北京、广州、香港三地的女性人口就业现状进行了抽样调查。

北京(简称京,下同)、广州(简称穗,下同)均以大陆劳动人事部门所规定的十二大行业为抽样框,从中进行随机抽样。在三地共同使用同一问卷,北京发出问卷5 000份,广州发出问卷2 000份,回收率均在80%以上。北京、广州被调查对象的年龄绝大多数为25~44岁,占70~80%;已婚者居多,占86~90%;行业覆盖率达100%。调查考虑到北京市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特点,因而在科教文卫等行业取样较多,占23%。以上取样比例与北京、广州两地实际情况相符合,因而具有代表性。

香港方面以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通过政府统计署,在香港住户中选出1 552户做为调查对象。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邮寄问卷;第二阶段采取上门探访形式派访问员入户调查。受访者中20~39岁者占77.8%,已婚者占63.1%。受访者从事最多的行业是制造业,占24.8%;其次是金融、保险及商业,共占18.6%。通过这次调查可对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妇女就业状况异同有一初步了解。

一、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女性就业的根本出路和前提

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能超越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在物质、文化水平发展较高情况下,女性就业、男女平等的条件相对充分一些。在生产力尚不发达、人口众多、劳动力供过于求、家务负担过重的情况下,女性的实际待遇要更低一些,性别歧视的问题也愈突出。

由于三地经济条件,尤其是香港与京、穗大不

相同,因而女性就业状况有很大不同。香港的经济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于市场力量所支配的自由企业制度。它的经济起步较早,发展速度较快,人均生产总值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由于香港经济得以最大限度地开发,所以第二市场一般供不应求,职位空缺普遍。香港第三产业占香港生产总值的2/3,而且多元化并呈不断上升趋势,因而能较多地吸纳女性劳动力,女性就业较充分。政府劳工处设有若干就业辅导组,协助雇主聘请合适的求职人员就业。一些需用女工较多的企业,雇主用开办托幼园所等吸引女工就业。可见香港女性就业途径多样、方式灵活。妇女亦在其中受益。此次调查问卷中有关女性求职所遇困难一项,当问及“如果现时要你自己找寻职业,你估计自己是否会遇到困难”,北京和广州分别有3.9%和8.9%的妇女认为不会遇到困难,而香港有45%的人认为不会遇到困难。当问及寻找职业所遇到的具体困难时,北京、广州排在第一、二位的困难是个人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和由于自己的性别,其次是缺乏有关工作空缺的信息及用人单位没有招工指标等。这反映了北京和广州劳动力市场尚未健全,人们很难有择业机会、信息和途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在对劳动者选择时性别歧视比较严重;对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要求不高,并难以对其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等状况。而香港排在一、二位的是教育水平低、缺乏一技之长,因性别问题而难找职业的则被排在最后一位,反映了香港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就业不足,对劳动者重视技术素质等状况。在问及“男女招工时被录取的机会”一项时,香港认为女性比男性机会多,而北京、广州受访者认为这一项女性的境遇最差。尽管香港也存在性别歧视和男性就业中待遇实际高于女性的情况,但总体来说,女性就业是有充分保障的。但这也不是香港女性就业的全部。据1986年香港人口调查,香港有外发工4万多人、半日工4万多

人,大部分为女性,这类工作条件较差,不受劳工法律保障,说明一些文化技术素质较差的女性不仅低层次就业,而且没有社会保障,风险较大。北京、广州女性一经就业,尤其是进入全民所有制企业,就能够终身就业,而且有一定法律保障。北京、广州改革开放十年来,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改变,为女性就业广开了门路。尤其是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北京、广州都建立了人才交流中心、劳务市场,为妇女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工作创造了条件。据1988年统计,广州全市女性待业人员1.91万人,占全市待业人口的36.7%。从业女性占适龄劳动女性的97.63%,待业率仅为2.37%,比男性就业率高2个百分点。但就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就业主要矛盾是劳动力供大于求,已就业者的再次择业、阶段就业,尤其会对女性带来种种不利情况。对此应有充分认识。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由政府资助或由民间组织自办的社会服务比较发达,不仅网络健全、服务项目丰富多样,而且从管理人员到服务员,有一批专门从事家务服务事业的员工,使家务劳动成为职业化、社会化的一种工作。香港的社会服务多根据年龄界定,几乎没有专为妇女所设立的,但也大大减轻了妇女家务劳动的负担,为她们就业解除了部分后顾之忧。从个人问卷的情况看,北京、广州的被访者中,分别有73.4%、64.4%的家庭有需要照顾的老人,香港被访者中29.6%有需要照顾的老人。但同时,香港妇女认为政府对在职妇女的社会服务及政策上支持不足,以至于妇女难以同时兼顾工作与家庭。一部分香港妇女雇佣外籍女佣以减轻家务。据1990年统计,香港共有外籍女佣3万多人,他们多来自菲律宾及泰国。这些女佣面对语言障碍,并且未经训练及辅导,所以辅导孩子功课、家庭生活细节安排、财政管理仍由主妇承担。北京、广州两地政府及群众团体组织兴办了多种类型的托幼园所、家务服务公司(介绍家庭服务员等),但因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仍远不能满足在职女性的需求。问卷中,北京、广州两地女性对多办托儿服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决请保姆难等问题呼声较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发展了生产力,女性就业才有广阔的前景,女性就业的后顾之忧才有可

能根本解决。

二、从三地女性对自身解放的诸多共识中,反映出妇女解放的趋势与潮流

当代女性广泛参与社会生活,争取全面发展与提高,已成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明显标志,也成为妇女解放的目标与追求。妇女解放的程度在社会环境与妇女自身素质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下不断提高。尽管三地妇女所处社会环境制度不同,但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从此次调查的个人问卷看,三地大多数女性都有强烈的参与社会的愿望,都认为有必要去争取实际生活中的男女平等,都否定自贬自责的心理。

在进行就业动机的考察和分析时,三地女性对问卷所列10个因素的前三位的回答是一致的(见表1),即在就业主导动机上趋于一致。这一迹象表明,

表1 就业动机因素重要性排列顺位

地区 排列顺序 就业因素	北京	广州	香港
1. 经济收入	1	1	1
2. 自己在经济上独立	2	2	2
3. 发挥自己才能/实现自我	3	3	3
4. 对社会做出贡献	4	5	7
5. 打发时间	9	9	8
6. 妥善处理家务	6	6	6
7. 有较多管教子女的时间	5	4	4
8. 社会上大多数女性是否都在工作	8	8	9
9. 多认识些朋友	7	7	5
10. 其他(请说明)			

经济收入是三地女性就业动机中最主要的因素。与此同时,三地女性也看重个人在经济上独立这更深一层的内涵,投身社会生产劳动,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是实现自身解放的先决条件。发挥自己才能和实现自我被共同列为第三项,标志着当代妇女普遍把就业作为实现自我的一个重要途经,反过来又把实现自我、得到社会的承认与重视当作就业的一个重要目的,体现出女性的自立感和社会归属感。为进一步了解女性就业动机,问卷还设计了这样一问:“如果你的家人在经济上能承担家庭生活开支,你还会继续工作吗?”京、穗、港分别有93.8%、92.2%、90.3%的女性回答愿意继续工作或少做些工作(见表2)。在分析就业动机和其它变量关系时,资料显示,三地女性教育程度愈高,就业意识

表2 家人在经济上能承担家庭生活开支
女性是否还会继续工作的选择 (%)

地区 百分比 选择内容	北 京	广 州	香 港
还会工作	70.1	57.4	50.0
想少做点工作	23.7	34.8	40.3
不想工作	6.2	7.8	9.7

愈强，越认为实现自我重要；反之，则认为就业是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在工作”、“打发时间”等（见表3、表4）。

表3 北京、广州在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
与家庭经济允许情况下工作意愿 (%)

地区 百分比 选择项目	文化 程度 从未入学 小学肄业 小学毕业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北 京				
还会工作	88.2	61.5	70.5	73.0
想少作一点工作	11.8	26.4	23.4	23.4
不想工作	0.0	12.1	6.1	3.5
上 海				
还会工作	52.9	51.6	56.3	66.0
想少作一点工作	32.4	36.6	35.3	34.0
不想工作	14.7	11.8	8.5	

表4 香港在业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家庭
经济允许情况下工作意愿 (%)

地区 百分比 选择项目	文化 程度 中三/下	中五	预科	大学
还会工作	37.8	53.2	50.0	74.4
想少作一点工作	44.1	39.5	50.0	25.6
不想工作	18.0	7.2	0.0	0.0

在争取男女平等这一问题上，三地女性都对实际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感到不满。京、穗、港的女性各有95.2%、89.2%、70.8%认为“女性要做出成绩，往往比男子付出更大的代价”，反映了女性成功之艰难的现实。同时，三地女性都认为“在晋升机会上，男子比妇女多”，在“职位的社会地位”、“工作上的成就感”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不

满。三地女性迫切要求同男子一样得到晋升机会，在更多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才能，取得工作成就。这既是女性自信自强的标志，也是性别歧视的反映。

三、从对女性传统角色认同的差异，比较三地不同的妇女观

大部分女性虽然大多数都愿做生活与事业的强者，认为工作和家庭同样重要，但在对女性传统角色的认同上，三地女性却出现差异。当问及“家庭在你生活中有多重要”时，三地大多数女性都持肯定态度，家庭是职业女性的生活基地，家庭又需要女性充分扮演好她们的角色，对女性来说，关键的认同之一来自于家庭，在这方面三地无明显差异（见表5）。在问及“工作在你生活中有多重要”时，北京、广州的女性对工作肯定程度更高（见表6）。但当问及“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你愿如何分配你的精力”时，北京明显向“以工作为主”一方倾斜，广州居中，香港则向“以家庭为重”一方倾斜（见表7）。由此可见：第一，大陆职业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愿望强烈；第二，香港妇女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工作虽已成为香港女性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但女性以家庭为主的传统观念仍有较强影响，香港女性面临的职业与家庭的内心冲突强

表5 家庭在女性生活中重要程度比较 (%)

地 区	北 京	广 州	香 港
非常重要	69.7	74.5	59.5
颇为重要	16.0	14.7	27.6
比较重要	12.0	9.7	7.6
略为重要	1.4	1.1	4.7
全不重要	1.0	0.0	0.7

表6 工作在女性生活中重要程度比较 (%)

地 区	北 京	广 州	香 港
非常重要	73.5	57.6	39.9
颇为重要	11.6	16.2	31.7
比较重要	13.3	19.9	15.2
略为重要	1.6	5.2	11.9
全不重要	0.0	1.1	1.3

表7 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如何分配精力 (%)

地 区	北 京	广 州	香 港
以工作为主	32.1	18.2	6.6
较重视工作	11.3	6.1	5.9
两者并重	53.2	68.0	59.2
较重视家庭	2.6	4.4	16.9
以家庭为主	0.8	3.3	11.4

于京、穗女性；第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自觉意识和社会物质生产水平不一定成正比。在物质生活水平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积极创造条件，用使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方式，推动妇女解放的进程是有利于妇女发展的，不失为妇女解放的有效途径。

一个有趣的迹象是：对“女性要避免在工作成就上超越她的配偶”这一问题，北京、广州女性只有13.4%、17%的女性同意；而香港有45%的人同意。香港女性一方面觉得在工作成就上可以超过异性同事，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不可以超过自己的配偶。这种心态阻碍了香港女性在事业上的竞争力与进取心。一些香港女性避免地位比丈夫高而失去传统角色的平衡，一部分女性还主动转到无关紧要的工作岗位，以免超越丈夫而造成双方不平衡。这反映了香港女性在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面前的矛盾心理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

四、从三地女性对政府及自身的期望，探索解决女性就业的具体途径

三地女性一致认为政府对女性就业负有重要责任，但对政府的要求及其排列顺序有所不同。北京、广州的女性对政府的希望和要求第一就是制定有关就业法律；第二是分配职业，而后是提供职业训练等。香港女性第一要求是提供失业保障；第二是制定有关法律，而后是协助寻找职业等。由于香港求职是通过劳务市场，故不存在要求政府分配职业的问题（见表8）。以上资料可见，第一反映了北京、广州在业女性法律意识增强，希望以法律作为就业的保障和调节工具，强烈希望制定有关女性就业的具体、微观的法律细则。香港的法律一经形成，有较严格的执法监督。如妇女在怀孕期间出示怀孕3个月、6个月的证明，雇主不得因此而开除女工，违者女工可以起诉，直至对雇主进行罚款等制

表8 就业问题上政府应负的责任

地 区	北 京	广 州	香 港
分配职业	2	2	—
协助寻找、介绍职业	5	5	3
提供职业训练	3	4	3
提供失业保障	4	3	1
制定法例	1	1	2

表9 对产假安排的希望 (%)

产 假 安 排	北 京	广 州	香 港
三个月全薪产假或六周支2/3薪产假	42.5	27.2	49.2
停薪留职，由妇女自由决定复工时间	17.4	21.4	15.0
停职、部分支薪、三年内由妇女自由决定复工时间	38.9	47.9	16.3
其 他	1.2	1.2	19.6

裁；第二，北京、广州女性在就业问题上对政府的期望反映了希望政府实行计划就业的思维模式。而在香港，政府不负责安排就业，只在宏观上对就业进行指导和调节，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同就业者的直接矛盾较小，就业者在求职上也不依赖政府；第三，香港在业女性第一位的希望是要求政府提供失业保障，反映了在业女性所承担的失业风险较大，失业后的生活保障是就业者比较大的后顾之忧。相对而言，大陆女性在这方面安全感较强，女性就业稳定性强，基本是终身就业，所以，对要求政府提供失业保障呼声不高。

在问及失业人士所需的基本开支应由谁负责时，三地在业女性的认识略有不同。三地女性都认为政府对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开支负主要责任，但香港和广州个人承受能力强于北京，尤其是香港，把个人负责放在和政府负责同等重要的位置。而在北京，家庭承受力高于个人，个人承受力相对较低，家庭对失业者的生活能起“缓冲作用”。

在对产假安排的期望上，三地女性各有其选择。对在业女性产假的安排，大陆与香港政策不

（下转第50页）

有利于低人口出生率的文化强制。行政强制和法律强制应当有利于低人口出生率文化强制的形成。但是农村在实行计划生育时,行政控制的行为目标单纯地着眼于生育胎数,反而强化了生育男孩的妇女无上光荣的文化势态,形成了一定要生男孩的文化强制。这是行政强制与由此而来的文化强制彼此相悖的典型事例。因此如何确定农村计划生育的参数控制方式,以及如何建设和利用农村文化环境,使那些不得不采取的行政或法律的强制能和走向未来的文化强制协调一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如果恰当地利用二元经济中农村居民向往城市的基本心态,设计一项政策,使那些初育年龄超过一定标准而又只生了一个女孩的农户,当达到基本教育水准后能享有“农转非”的待遇,这可能是在农村中形成低人口出生率并提高女性文化水准的巨大文化强制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三)社会强制必须规范化、制度化,并且要对行政强制、法律强制本身实行监督。规范化和制度化是赋予社会强制以理性的重要方面。有关法规的制订要理直气壮,丝毫不必讳言计划生育工作中所必须的社会强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应当由中央政府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有关行政

法规,必须明确至操作层次,尽可能由省一级政府提出,由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及县以下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实际上是执法部门。如果把立法职能向下转移,既混淆了立法和执法的不同职能,也容易造成不规范的社会强制。只有当涉及到不同区域文化和经济特点的某些具体条款,才能交由较下级的政府因地制宜地把握。但是也仍然要由地方政府提出,由地方人大通过明确的行政法规,使一切行政强制和法律强制的具体操作,都有章可依。计划生育部门应当直接拥有对计划生育法规的督查和执法权,如同税收部门、物价管理部门一样。如果计划生育部门只是提出奖惩办法,另有司法部门去执行,这将会导致行政强制在运行中的割裂,并导致严重失效。对各级执法部门必须加强监督,要实行廉政和勤政。行政诉讼法的执行,在中央和省充分承担起立法职能后,不应当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障碍。相反,这是使计划生育工作规范化、法制化,从而使计划生育工作中所必要的社会强制能有效运行的充分保证。

(本文责任编辑 汪正鸣)

(作者工作单位: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上接第64页)

同。大陆自1988年实行90天全薪产假,产假时间相对较长;香港实行6个星期及2/3薪产假,产假时间相对较短。北京、广州、香港在业女性仍愿采用现时这种产假安排的有42.5%、27.2%和49.2%。此外,对于停职、部分支薪、三年内由妇女自由决定复工时间的产假安排,北京、广州、香港各有38.9%、47.9%、16.3%的人赞成,这种方式较受大陆,特别是广州在业女性的欢迎(见表9)。

在问卷最后一部分涉及女性自身权益方面的问题,三地女性最不能接受的是“女性因生育而被列入富余人员行列是应该的”这一说法。女性因承担人口再生产和行使做母亲的权利而被拒于就业之外,引起女性强烈的反感和不安,并要求保护这方面的权益。

北京、广州大多数女性还期待改变传统用工形式,采用灵活多样的适合女性就业特点的工时制度和就业形式,如半月工、小时工、计时工、临时工、外发工、半工半休弹性工等,以提高劳动生

产率的前提下,满足女性的多种需要。并建立健全人才交流市场,使单纯指令性计划体制下的刚性就业制度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弹性就业制度转变,为女性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香港女性则希望政府在讨论本港福利政策时,增加有关为妇女服务的法例。

在调查中,通过走访、座谈,三地女性对自身也提出了期望和要求。北京、广州女性认为,对女性进行自强不息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抛弃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也要改变对国家的种种依赖,和依仗女性的特殊性心安理得接受照顾、不求奋进的心态,树立起自强不息的现代女性形象。三地女性共同认为,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程度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

以上四个方面仅是女性就业研究的开始,愿人们更多关注它,探讨出更多的女性就业问题以便充分发挥女性创造力。

(本文责任编辑 张京华)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市妇女联合会)